

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①之势。因此,从“三海一体”的角度看,我们可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割式的孤立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可以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在此认识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海上力量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②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

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以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方向。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将是把所有的竞争对手推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与战略选择

王晓鹏(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郑海麟(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一、缘起

近年,美国不断强化在南海周边的战略部署,意在挑动南海局势走向复杂化与扩大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妄图实现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升级,由过去试图充当的“中立者”“制衡者”角色,转而成为南海问题的“仲裁者”,逐步将介入南海问题的模式由有限介入、介入而不

陷入变成深度介入,将隐性介入变成公开介入。

目前,日本战略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南海问题,妄图与美国共同打造“东海—南海争端链”,并将该问题作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试验

^①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全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3页。

^② 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田和着力点。在此基础上,日本妄图构建包括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北印度洋在内的战略通道,逐步实现日本自卫队的人员、装备走向海外。因此,日本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不断进行利益绑定,借此实现其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目的。

菲律宾强推所谓南海仲裁案,妄图将其在南海的非法利益固定化。菲方“仲裁”的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仲裁结果”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及其他海洋权益,并为美日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制造借口。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关键性历史证据对美日菲等国在南海的非法行径予以反驳。

二、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

诸多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以及华人移殖南洋,至迟为始于唐代。^①至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来到南海区域,则是明朝末年的事。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二战”结束后,冷战爆发前,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是抱着积极支持态度的。原因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同盟国,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中美两国曾并肩作战。而在“二战”期间,南海诸岛为日本所占,将其“纳入版图”,改名为“新南群岛”,隶属台湾省管辖。日本战败,“二战”结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将那些通过武力占据的岛礁归还中国。于是,国民政府于1946年派出军舰收复南沙群岛,并且于当年12月12日在太平岛上刻石立碑,宣示收复南海主权。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根据1935年1月出版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绘制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将南海诸岛分为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四部分,将其纳入中国行政区域版图。

对此,作为盟友的美国,对于中国政府收复

南海诸岛是积极支持的,对战后国民政府出版的行政区域图包括南海诸岛也是认同的,原因是这些岛屿在“二战”前都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作为战胜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收回南海诸岛的主权也是合理合法的。这点可以美国1947年版的地图为证。

2015年5月间,明报(加西版)记者在温哥华旧书摊发现一本1947年美国出版的《柯林斯地图集与地理名词索引》(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的地图兼地理词典,该词典中收录的一幅地图由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Nally)公司绘制,其题目为《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暹罗及朝鲜的公认地图》(Popular Map of China, French Indochina, Siam, and Korea)。该地图详细描述了南海诸岛情况,并将部分岛礁明确标示了主权属于中国。该图在“Paracel Islands”(即西沙群岛,为部分殖民主义者在当时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地名下方,附上了“China”(中国)标签,这表明该地图绘制者已经认识到将“西沙群岛”归属于中国这一事实。

绘制该地图的兰德·麦克纳利公司一直是美国地图绘制业的中流砥柱,在地图绘制界享有极高声誉,其出版的地图权威性颇高,故而此图亦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该地图集内还收录了另一幅菲律宾及南沙岛礁的地图。虽然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一贯密切,但该地图绘制者对南沙岛礁所标记的6个名字,没有一个是菲律宾所起的名字。而对于其他地域的主权所属则皆有明确表述。如台湾(Formosa)下面用括号标注“(Taiwan)”,然后再加上“China”(中国)表示主权归属中国。香港则标注属英国,澳门标注属葡萄牙、印支三国(即越棉寮)属法国,马来西亚属英国。从主权归属的表述看,这本美国版地图集基本上是按战后公认的国际秩序来绘制的。因此,这本地图集可以说是战后(1947年)美国承认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铁证。

^① 关于“二战”以前中国对南海诸岛领有权的考辨,笔者在之前曾撰文论述,参见:郑海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有权考辨”,《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期,第1-3页。

中国人在南海诸岛活动的事实,不仅有大量的中国史料记载,而且也不乏外国史料供佐证。据187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海军档案《中国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以下简称《指南》)第二卷第64—66页有关郑和群礁(Tizard Bank, with Reefs and Islands)的章节提到:“在大多数岛屿上都可以看到海南渔民(Hainan fishermen),他们以采集海参以及龟壳作为生计。其中一些人在这些岛礁上生活了几年。来自海南岛的中国帆船每年都会前来这些岛礁,为他们供应大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渔民则以海参和其他产品作为交换,并把所赚的钱寄回家。这些中国帆船在12月或1月离开海南岛,等到西南季风吹动之时便立刻返航。太平岛(Itu Aba)居住的渔民比生活在其他岛礁上更舒适,因该岛的淡水井的水质比其他地方为佳。”

上述英国海军档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海南渔民百多年前在南沙群岛休养生息的历史。这些文字从独立第三者的角度印证了中国史料的记载和中国渔民多个世纪以来的说法。

该《指南》第二卷第67—69页还提到中业岛(Thi - Tureefs and Island)及其周边岛礁有中国渔民活动:“中业岛(North Danger Reef)水域有两个沙洲,两个沙洲附近经常遇到来自海南岛的中国渔民(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inan)在那里采集海参、龟壳等水产。他们从东北部一个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但《指南》却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渔民。中业岛目前被菲律宾占据。而且,该《指南》还提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英文名称,其实来自海南岛渔民,比如英文称Lan-keeam Cay,即源于海南人说的铜金峙或铜锅峙,而不是源于菲律宾的命名。

此外,《指南》第二卷第383、384页有关海南岛的章节,还记录了中国渔民曾经常年居住在南沙岛礁之上,他们“在中国海(China Sea)的东南部,在数量众多的沙堤与暗礁之间捞捕海参,并将海龟与鱼翅晒干”;“他们的航程在3月开始,首先抵达北边的浅滩,放下一两位船员,以及数罐淡水,然后继续航程,前往婆罗洲(Borneo)附近较大的暗礁继续捞捕,直至6月

初返航,顺路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及其捕获的海产。在中国海,我们在岛礁之间遇到不少这些渔船。”

从上述英国海军档案的记载来看,海南渔民在南沙群岛已经从季节性的捞捕发展成为常年的生产开发活动,由于生产开发的需要,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从临时性的居住发展为在部分岛礁上长期定居,并因此与海南岛建立起定期的贸易关系。除了渔民之外,还有商人也穿梭往来于南沙群岛,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由于当时并不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夺,因此,英国海军档案的记载正好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印证了中国史料的记载和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的口头传述,从而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南海更路经》是记录中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南海诸岛中西南沙群岛航行过程中的航向和航程的书,是中国海南省渔民在相关岛礁海域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世代流传的航行指南,是研究中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史料。《南海更路经》可分为手抄《更路簿》和口传“更路传”,学界一般统称为《更路簿》。《更路簿》中反映了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线路以及他们对南海诸岛,尤其是西、南沙各个岛、礁、滩、沙、洲的命名。这些地名有将近200个。记载的作业线路及贸易线路有200余条,主要记录了中国海南省渔民从海南省东部琼海市的潭门港和文昌市的清澜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至南洋地区的航向(古称航海针位)和航程(古称更数)。笔者在多年间赴海南省潭门港等地调研过程中曾发现过多种版本的《更路簿》。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准确的,与今天的经度和纬度相比较,其误差很小,而且在这些《更路簿》中已经记录了海流方向与航行的关系。

帆船时代,我国海南渔民在每年的立冬或冬至时乘东北季风驶往南海诸岛进行捕捞作业。起初,他们将捕捞的渔获物运回海南岛售卖,其后由于生产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渔业捕捞范围的扩展,其中部分渔船亦驶往南洋地区

从事早期对外贸易活动。中国海南渔民一般在翌年的清明或端午前后采购外国商品,乘东南季风驶回海南岛,并将这些商品在本岛销售。在这一过程中,海南渔民逐渐了解并熟知了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基本情况,出于方便海上航行和驻岛生产作业的目的,他们对相关岛礁进行了命名,而这些岛礁的渔民俗称大都流传于“更路传”或是记载在各种手抄本《更路簿》之中。

《更路簿》中记录的南海诸岛各渔民俗称的文字和发音都是以海南方言作为基础的。^① 这些地名最初的传承方式以“更路传”为主,后来,随着海南渔民对相关岛礁的开发日益形成规模,他们便把岛礁的渔民俗称用其特有的文字表述形式记录在各种手抄本的《更路簿》中。

以前文中提到的两处岛礁为例。《更路簿》中“黄山马”的官方命名是太平岛。海南渔民一般将山脉的轮廓称作“山马”。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天然岛屿,当海南渔民看到茫茫大海中出现一个较大的岛屿时,就会以“山马”描述之。因太平岛是海南渔民传统的站峙点和居住地,所以渔民驾船前往太平岛往往是在金色阳光照耀的傍晚。所以,海南渔民便按照岛屿的形状和颜色将称其为“黄山马”。

铜金的官方命名为杨信沙洲。据传,古时候曾有渔民在杨信沙洲附近发现数量十分巨大的金块,一开始,渔民只把那些金属当做铜块。渔船返航后,有人将这些金属块送予金匠检验,被确认是黄金。其后再开船赴原地打捞,那些金块却荡然无存。于是,渔民出于对分不清是铜是金行为的自嘲,便把该岛命名为“铜金”。

《更路簿》中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海上捕捞及驻岛生产活动已经构成了“先占”。而在同时代的外国文献中,至今未见类似记载,因此,《更路簿》所载中国海南渔民的海上活动符合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规定,进一步证明了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

至迟自清前期开始,海南岛潭门等地的基层政府,即针对当地渔民赴南海诸岛的渔业生产及驻岛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主要方式为

颁布许可、米粮限购与所得税征收。当时渔民出海必须获得乡一级政府的许可,基层政府依据船主上报的南海海上航行线路之远近、船工人数之多寡等要素确定其携带米粮的数量。^② 渔船返回母港后,基层政府则委派民团人员登船核查所得渔获数量,并以此作为所得税征收的依据。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要求东南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当时广东的船头油漆成红色,于是有了红头船之名;海船的两侧需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同时明令“取鱼不许超出本省境界……船只有照方能下海”。^③ 由此可知,至迟清初,海南渔民依据《更路簿》中记录的生产范围所从事的捕捞作业和岛礁开发已被纳入广东省行政管辖之下,中央政府多项政策的颁布及地方政府多项管理的实施亦充分体现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

三、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战略选择

究竟应该如何探寻解决南海争议问题的有效路径?笔者认为,中国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做两手准备。同时需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在维护“主权在我”的前提下讨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面对美日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及日趋复杂的局势,学界特别有必要仔细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战”后美日等国对东南亚各国采取的立场和外交政策,同时还有必要研究其他类似解决海域争端的国际法案例以及外交实践,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更加全面的智力支撑。

本期专题编辑 李 亚 邓文科

① 曾昭璇、梁景芬、丘世均合著:《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② (清)《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③ (清)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07。